

## 第八章 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上的合浦

### (代结语)

南流江发源于大容山南麓，自东北向西南流经北流市，玉林市玉州区、博白县、浦北县，在合浦境内分为南干江等水道注入廉州湾，全长 287 千米，流域面积 9439 平方千米。南流江是桂东南地区独流入海的较大江河，逾桂门关分水坳可联系北流江，继而通过西江中游经湘桂走廊、潇贺古道抵湘江一线，成为中原进出北部湾的最便捷通道。包括合浦汉代遗存在内，南流江流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文物史迹和人文民俗事项，宜置放在“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的背景下考察审视。

“丝绸之路”是 1877 年德国地理学家裴迪南·冯·李希霍芬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从古代中国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商贸通道；其后法国汉学家沙畹提出“丝路有海陆两道”，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开始流行。丝绸之路的概念在使用中逐渐被泛化，出现了西南丝绸之路<sup>[1]</sup>、草原丝绸之路<sup>[2]</sup>、东北亚丝绸之路<sup>[3]</sup>、冰上丝绸之路<sup>[4]</sup>、史前江南丝绸之路<sup>[5]</sup>等表述。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类称谓通常具有三种含义。其一，在中外交通史、考古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中作为学术概念使用，不过很难在学术概念的层面上加以严格界定；其二，作为文化符号表现其历史喻意和现实政治意义，带有借喻性质，如 20 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实施的“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sup>[6]</sup>。正因为其借喻性质，“海上丝绸之路”有时也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亦称为“蜀布之路”，甚至在专题研究的意义上出现了“金属之路”<sup>[7]</sup>等名称；其三，应用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实际工作中，例如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sup>[8]</sup>。

由于海上丝绸之路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其内涵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时限、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性质确认，以及相关遗产点的文化价值阐释等方面自然会产生一些不同意见。

南流江作为连通合浦港口与广西内陆腹地乃至更远地区的内河航线，与汉代及其后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关联客观存在，在相关研究著作<sup>[9]</sup>、研究报告<sup>[10]</sup>中已经有着充分论述。有研究者指出，“南流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河支线。作为以合浦为出海口的河流，南流江的地位和作用与合浦港共进退”，“南流江南北大通道，是古代著名的‘南海道’‘通越道’‘交趾道’，是南海古丝绸之路的内陆组成部分，南流江航线则是最直接的部分，南流江流域是最近的港口腹地”<sup>[11]</sup>这些表述比较清晰地说明了南流江作为内河航线与海上丝绸之路尤其是合浦港的地理关联和文化关系。

在南流江文化史的既往研究中，一般侧重于内河航线或交通路线的表述，不过这种表述偏重于强调文化因素和族群交往的“流动”和“迁移”，相对忽略了南流江流域自身文化因子的“特殊”和“积淀”，这种情形有些类似于对“民族走廊”的片面认识<sup>[12]</sup>，由此在相关文化背景和历史特征的阐释上也就受到了局限。鉴于内河航线或交通路线的定位未必能够深刻阐明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因此有必要考虑借用“文化廊道”这一概念来解释说明南流江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价值的关联性。

廊道是景观生态学概念，原指与本底有所区别的条带状土地，具有连通与分隔的双重作用，这种双重作用造就出廊道内部以不同生态斑块形式表现出来的景观多样性，斑块彼此间可能发生冲突和干扰，每一斑块也未必能够适应生存下来<sup>[13]</sup>。通过这些景观生态学内容在人文意义上的解读和借用，即建立起“文化廊道”的概念。文化廊道本身及内部的斑块，都属于文化景观。通俗地讲，文化景观就是具有特定文化的族群、人群在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活动中所创造的劳动成果的系统形态，兼具自然环境属性和人文属性，是人类与自然界长期互动所形成的综合体，以演进和变化为其基本特征<sup>[14]</sup>。

在文化史意义上“文化廊道”和“民族走廊”的性质有些相似。走廊从建筑学概念借鉴为地理学概念，再逐渐演化为地缘政治学和民族学概念，需要同时满足通道和通道两侧的屏障两个条件，“而屏障有三：即地貌的屏障、生态的屏障和民族的屏障”<sup>[15]</sup>。文化廊道连通与分隔的双重作用也是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前提下得以发挥出来的。

南流江作为文化廊道，其连通作用是指在纵向（南北方向）发生的人群迁移和文化因素交流传播，比较容易理解；所谓分隔，是指流域内部的文化景观与“左邻右舍”不一样，即有所屏障。南流江谷地在地质构造上属于位于六万大山、大容山与云开大山之间的合浦断裂带<sup>[16]</sup>，东、西两侧为云开大山和六万大山所围绕，地貌屏障大致具备，流域内部除与周围区域共享“本底”文化基因外，还有与本底不同的异质文化因子，共同构成了各种文化斑块，形成流域内部相对稳定的文化共性特征，导致流域内、外文化景观存在较显著差异，即是分隔作用的表现。

“南流江文化廊道”在海上丝绸之路语境中就是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其历史现象表现为廊道内部的文化景观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价值的关联度较高（包括某些海洋型的文化特征和生计方式），而与廊道以外的文化生态差别显著。换言之，正是由于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的存在，才使得当地出现诸多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价值相关联的“非常态”的文化景观。此外，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陆地对接通道，其概念表述扣合了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文化线路类型”遗产的空间架构和价值特征。

有研究者指出：“南流江南北通道的范围因语境而定，就小范围而言，指合浦出海口至南流江上游码头的航线；就中范围而言，指合浦出海口至西江的航线，即还要包括北流江航线；就大范围而言，指合浦出海口至中原的航线，在汉代主要指西江、桂江、灵渠，甚至湘江以北达中原的航线。”<sup>[17]</sup>考虑到历史背景和民风世俗的共性和密切联系，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还应该延展至北流江上游地区。

依照《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玉林市申请列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的认识，南流江文化廊道上的海上丝绸之路遗产点主要包括北流铜石岭汉唐冶铜遗址、容县西山汉唐冶铜遗址、玉林市北流宋代岭垌窑址、兴业宋代绿鸦冶铁遗址、容县宋代城关窑址、天门关（鬼门关）遗址、茂（林）北（流）古运河遗址等。此外，《研究报告》还提及容县出土的波斯孔雀蓝釉陶器（唐代）、博白县宴石山摩崖佛像（隋代以前已有记载），以及郁林葛（唐代以来）、客家围屋（明清以来）、玉商文化、侨乡文化等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联的文物史迹和人文事项。已经列入《申报中国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申报文本（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申报文本》）的合浦汉墓群、大浪城址和草鞋村城址更应该包括在内。

《申报文本》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包含了承载遗产价值的海港航运体系遗存（包括海湾、码头、航标建筑、造船场、仓库、祭祀建筑、贸易管理机构、驿站、桥梁、道路、海防设施、商业街）、外销物品生产基地与设施遗存（外销瓷窑、丝绸织造工场），以及文明及文化交流产物（宗教建筑、外国人聚居区及墓葬区、贸易市场）、贸易物品遗存（珠宝、香料、药材等）等主要遗产类型及其代表性遗存要素”<sup>[18]</sup>。《研究报告》列举的遗产点、文物史迹和人文事项，在不同侧面显示出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价值关联，多可以纳入《申报文本》关于“主要遗产类型及其代表性遗存要素”的划分体系，其中一些在不同程度上符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标准，可以视为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中的文化景观。

除合浦外，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目前能够确认的西汉遗存不多，但是根据苍梧郡猛陵县的设置（位于北流江与浔江汇合处的今藤县），以及汉代海外舶来品或者具有海外文化因素的汉代文物在贵港、梧州、兴安、界首和平乐等地的分布<sup>[19]</sup>，可知这条文化廊道在西汉时期已经开通，这自然与合浦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sup>[20]</sup>。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是基于各国的官方保障，《汉书·地理志》有黄门译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的记述，《宋史·食货志》记载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始自南越国<sup>[21]</sup>，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时间一般认为是在秦汉时期或西汉时期，不过汉代合浦港口的海外贸易有可能早至先秦时期。秦出兵岭



南的动机即是“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sup>[22]</sup>，吕思勉认为，“《史记·货殖列传》言番禺为珠玕、犀角、玳瑁、果布之凑，此语非指汉时，可见陆梁之地未开，蛮夷贾船已有至交、广者矣”，“则秦汉未并南越时，中国与西、南洋久相往来矣。是知民间之交通，必先于政府”<sup>[23]</sup>。蒋廷瑜已经指出合浦港的出现要早于合浦郡县的设置，两千年前南流江当在今合浦县城西侧入海，合浦作为内河与海洋航运的结合点，在先秦时期就应该有了<sup>[24]</sup>。

合浦已经发现一批相当于南越国时期的考古遗存，其中双坟墩 D2 的年代为秦至西汉早期，D1 也有早至南越国时期的可能<sup>[25]</sup>；文昌塔墓地近来识别出一批南越国墓葬<sup>[26]</sup>（参见第三章第二节）；草鞋村城址手工业作坊区见有西汉早期的遗存堆积<sup>[27]</sup>；大浪城址的始筑年代也不排除为南越国晚期的可能性<sup>[28]</sup>；此外北流增劲塘城址可能始建于南越国<sup>[29]</sup>。这些考古发现说明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在南越国时期已经开通。《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有“汉遣伏波将军路博德讨越王。路将军至合浦”的记载，琼州海峡东西潮汐差异很大，风向、海流复杂，是航海危险区，唐代从交趾航海至徐闻时还要舍舟登陆<sup>[30]</sup>，路博德的进军路线大概就是缘南流江而下合浦。

《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玕、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玕、犀、玳瑁、果布之凑。”《史记集解》韦昭解释“果谓龙眼、离支之属。布，葛布”。有学者已经指出“果布”应该为马来语 Kapur（龙脑）的对音<sup>[31]</sup>。严格来说，《汉书·地理志》这段话是在讲“粤地”有这些物产，“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与《史记》特指番禺仍然有微妙差别。这些物产既往多笼统以为是海外舶来品，其实未必尽然，因为“粤地”合浦亦“海出珠宝”<sup>[32]</sup>，交趾“土多珍产，明玕、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术之属，莫不自出”<sup>[33]</sup>，尤其是从海外输入铜原料或铜制品并无必要。桂东南地区唐宋时期以铜矿产地著称<sup>[34]</sup>，时人将当地铜业生产传统追溯至南越国时期，称“铜山，昔越王赵佗于此山铸铜”<sup>[35]</sup>。北流铜石岭冶铜遗址的年代可能在东汉至唐代<sup>[36]</sup>，更早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汉书·地理志》记载的“铜”有可能产自桂东南地区。合浦、交趾的“珠宝、珍产”和桂东南地区的“铜”可以经由这条文化廊道运销各地，包括在番禺集散。

秦汉时期桂东南山地有许多西瓯、俚、蛮、乌浒人群，郡县治所之外并非秦汉帝国的实质统治区，当地东吴时期置合浦北部都尉，西晋置合浦属国、刘宋泰始年间（465-471年）在合浦北部设立越州，就是因地制宜，以便更有效地掌控这一地区。由于这种特殊的族群分布态势，桂东南地区成为汉代岭南社会文化两大板块之间的连接过渡地区<sup>[37]</sup>，当地汉晋南朝时期基本保持着土著文化的“本底”状态，南流江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廊道也就成为一条特殊的文化地带。

瘴气是一种对中国南部、西南部、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历史生态现象<sup>[38]</sup>。汉晋时期岭南地区多有“瘴气之害”<sup>[39]</sup>，唐代尚称南流江为“瘴江”<sup>[40]</sup>，桂东南地区当时的交通状况整体而言仍然较为闭塞。不过瘴气具有季节性，“瘴江”之称大概主要是形容周边环境不适宜中原人居住生活，而不是指水路交通本身的绝对封闭。在此种环境背景下，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及其历史意义也就更加凸显。由于琼州海峡是航海危险区，合浦在海洋交通上的安全便捷优势明显，这也是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地理背景。

明晓这些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背景，可以更深刻地阐释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上丰富多样的文化景观作为文化斑块的存续状态和文化遗产价值。南流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廊道延续至唐宋明清时期，其历史特征还应该在连通与分隔的双重作用、文化景观的多样性、不同生态斑块冲突适应等方面结合历史背景做具体分析，并且应该在文化线路遗产类型的性质、价值等方面加以把握。

贾敬颜的一段话很好地概括出秦汉时期汉人扩张的通常方式和过程。“大约汉人向外发展，靠的坚刃利兵与政治上的优势，其次随之而来的是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技艺、文化。首先打出一条通道（所谓开某某道即是），这条通道，往往顺沿河渠或在山间峡谷中，然后修建一座或几座城堡，于是便以此点面为根据地向四周开展、拓殖，去联络或征服当地的民族、部落，这就是秦、汉两朝在边区所开的郡与县；一旦力量衰落了，鞭长莫及，那些交通线和城堡便归于废弃。待力量恢复后，再行重建，这又是那些郡县旋兴旋废的缘故。交通线与城堡之外，大片的山林渊薮，仍归原地的民族、部落居住，汉人愈向四周发展，一方面使少数民族汉化，另一方面也为汉人的少数民族化提供了便利。”<sup>[41]</sup>

- [1] 西南丝绸之路亦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蜀布之路”“川滇印缅古道”。参见霍巍、赵德云：《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西南的对外文化交流》，巴蜀书社，2007，第12-14页。
- [2] 石云涛：《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9期。
- [3] 傅朗云：《东北亚丝绸之路初探》，《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 [4] 朱科全：《“冰上丝绸之路”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 [5] 席龙飞：《跨湖桥独木舟的制造工具》，杭州萧山跨湖桥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11。
- [6]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实施为期10年的丝绸之路国际考察，有些学者建议将考察路线命名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古代东方与西方各民族之间，除商品与物质交流外，还包括政治交往、特别是文化交流，而蚕丝纤细绵长，恰恰代表了古代东西方之间，因交通条件不发达而只有涓涓细流式交往。此外，丝织品高贵轻柔，深受各国人民喜爱，用它来命名这项计划，能够涵盖古代东西方之间物质、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因此，该项目最终确定为“丝绸之路：对话之路综合考察”。参见刘迎胜：《丝绸之路的缘起与中国视角》，《江海学刊》2016年第2期。
- [7] 杨建华、邵会秋、潘玲：《欧亚草原东部的金属之路：丝绸之路与匈奴联盟的孕育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8] 《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定义为：“作为文化线路类遗产，‘海上丝绸之路’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指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7世纪古代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各国通过海上交通线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方面进行的跨文明、跨文化交流之路”。参见中国建筑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征求意见稿），2012，第13页。
- [9]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口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 [10] 玉林师范学院课题组：《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玉林市申请列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研究报告》（内部资料），2016。
- [11] 玉林师范学院课题组：《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2016，打印稿，第5-6页。
- [12] 徐新建：《“族群地理”与“生态史学”——“由藏彝走廊”引出的综述和评说》，载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82-110页。徐新建认为“民族走廊”的称谓是比喻手法，“突出着其与别的‘板块’区域比较时的‘狭长地带’特征。可若就此过分强调‘走廊’内各族群的迁移与流动而忽视他们的世居传承，则有将此区域内长期以来众多族群的及生活‘抽空’的危险”。
- [13] 徐峰：《玉油坊类型龙山文化南徙路线重建——兼论江淮地区的“廊道”性》，《中原文物》2012年第2期。
- [14] 吴小华：《荔波瑶山白裤瑶——村落文化景观个案研究》，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 [15] 艾南山：《从地理学谈“藏彝走廊”》，载石硕主编《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第137-142页。
- [16] 广西民族博物馆课题组：《南流江出海口历史上海岸线变迁及汉代港口位置》（内部资料），2012，第4页。
- [17] 玉林师范学院课题组：《南流江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内部资料），2016，第6页。
- [18] 中国建筑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申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申报文本（征求意见稿）》（内部资料），2012，第204页。
- [19] 熊昭明、韦莉果：《广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第73-77页。
- [20]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2015。
- [21] [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卷一八六，中华书局，1977，第4558页。
- [22] [汉]刘安：《淮南子·人间训》卷二十五，明嘉靖九年（1530年）刻本，第25页。

- [23] 吕思勉：《读史札记》，译林出版社，2016，第488页。
- [24] 蒋廷瑜：《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桂岭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第119-207页。
- [25]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县双坟墩土墩墓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4期。
- [26]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广西合浦文昌塔汉墓》，文物出版社，2017。
- [27]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广西师范大学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合浦县草鞋村汉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6年第8期。
- [28] 熊昭明：《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8，第31-32页。
- [29] 熊昭明：《广西发现的南越国遗迹述评》，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研研究所、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西汉南越国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0，第35-41页。
- [30] [唐]刘恂：《岭表录异》，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8-29页。
- [31] 韩槐准：《龙脑香考》，载《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1941，第3-19页。
- [32] [汉]班固：《汉书·孟尝传》卷七十六，中华书局，1962，第2473页。
- [33] [南朝]范晔：《后汉书·贾琮传》卷三十一，中华书局，1965，第1111页。
- [34] 唐武德四年（621年）以北流县（今北流市）、普宁县（今容县）设置铜州。民国二十四年修纂的《北流县志》记载，“铜石山，……唐初建铜州，是从此山名之”。
- [35] 《太平寰宇记》卷一五八“春州铜陵县”条，《旧唐书·地理志》记铜陵县汉属合浦郡。
- [36]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北流铜石岭汉代冶铜遗址的试掘》，《考古》1985年第5期；玉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玉林市申报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考古工作成果汇编（征求意见稿）》，2015，第77-92页。
- [37] 郑君雷：《岭南汉城与西汉时期岭南汉文化的形成》，载《边疆考古与民族史论集》，科学出版社，2019，第219-231页。
- [38] 周琼：《清代云南澜沧江、元江、南盘江流域瘴气分布区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2期。
- [39] 王子今：《汉晋时期的“瘴气之害”》，《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3期。
- [40]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地理志四》卷四十一，中华书局，1975，第1759页。
- [41] 贾敬颜：《历史上少数民族中的“汉人成分”》，载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第192-210页。